

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

圖像資料卷

丛书总主编 迟文杰

本分卷主编 陆惠红

编纂机构 新疆天山天池管理委员会

学术支持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33-8289-7



9 787563 382897 >

定价: 180.00 元

末 PBMV 逐渐取代了闭式二尖瓣分离术。

3. 手术治疗:

(1) 闭式二尖瓣分离术: 本术式较简单, 术前超声检查, 只要没有左房血栓、MR、钙化和腱索缩短不甚严重, 都是闭式分离的适应证。本术式的死亡率是 1.5%。手术引起严重 MR 的发病率是 0.3%。术后每年再狭窄的发病率是 6.7%。长期的随访表明, 术后 18 年的实际存活率为 89.5%。近年来, 由于 PBMV 治疗 MS 的疗效与闭式分离术相近, 因此, 目前多应用 PBMV 以解除 MS。对中度或重度 MS、疑有心房内血栓形成、瓣膜重度钙化或腱索明显融合缩短的患者, 应行直视式分离术。

(2) 直视下二尖瓣成形术: 本术式在低温阻断循环直视下进行, 需要体外循环。术者直接将狭窄、增厚、相互粘连的瓣叶分离, 重新修整, 按原位缝合, 清除心房的血栓, 同时把融合的腱索分开, 即使二尖瓣叶发生钙化, 甚至合并中度的 MS, 通过二尖瓣成形术, 狭窄和反流都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纠正, 是 MS 比较理想的手术方法。因为它充分利用患者自身的瓣膜, 不存在异体植入, 不用解决异物或异物排斥的问题。术后 10 年的存活率为 95%, 术后需要重新手术的发病率大约每年 1.7%。

(3) 人工瓣膜置换术: 我国于 1956 年在上海首先用国产球瓣置换二尖瓣获得成功, 1976 年北京研制成功牛心包瓣膜, 1978 年上海研制出倾斜型碟瓣和广州、上海等地相继制成了猪主动脉瓣。据报道, 未发现国产瓣与进口瓣在远期疗效中的差异。人工心脏瓣膜置换手术成功率与国外先进水平基本相同。术后 10~20 年生存率高于国外。

人工心脏瓣膜可分为两大类。①机械瓣: 由人工材料制成。机械瓣经久耐用, 不致钙化或感染, 但须终身抗凝血治疗, 伴有溃疡病或出血性疾病者禁用。②生物瓣: 由生物材料制成。生物瓣无须抗凝血治疗, 但可因感染性心内膜炎或数年后瓣膜钙化或机械性损坏而失败。因此, 学者们主张生物瓣仅用于老年人及抗凝血治疗有禁忌的患者。

MS 患者其二尖瓣钙化、粘连、增厚等, 使瓣膜功能完全丧失, 此时扩张及整形均不能使狭窄解除及恢复瓣膜功能, 惟一的选择是做瓣膜置换术。通常手术死亡率为 3%~8%。

1) 手术指征: ①心功能Ⅲ~Ⅳ级, 伴有明显 MS 和(或)主动脉瓣病变, 且左室增大。②瓣膜严重钙化, 以致不能分离修补。③钙化粥样瘤引起狭窄者。④左房血栓形成或有栓塞史者。⑤MS 经过闭式扩张或直视瓣膜交界切开术后, 除二尖瓣叶病变加重外, 在两交界切开处都有明显的钙化灶裸露, 形成珊瑚礁状突出, 随时都可能有钙化碎屑脱落形成栓子。如再行直视成形术, 估计也难以恢复其瓣膜应有功能。

2) 术后并发症及其治疗: ①瓣膜血栓, 人工瓣膜血栓发生率为每年 0.5%~5.7%。A. 原因: 形成血栓的主要原因除了因抗凝血不足和人工瓣膜有关之外, 常与下列因素有关。术前已有或术后出现房颤, 长期不能得到纠正的巨大左房者; 术后出现低心排血量综合征; 人工瓣膜口遗留一定程度之狭窄区域, 造成血流漩涡; 血液呈高凝状态; 细菌性心内膜炎等。B. 临床表现: 术后逐渐或突然出现瓣膜狭窄或关闭不全征象, 如心悸、气促重新出现, 体循环栓塞; 听诊时可发现新的心脏杂音, 机械瓣置换术者其清脆的瓣膜机械碰击音变为低钝; 超声心动图表现瓣膜活动度减少, 跨瓣压差变大, 瓣膜口面积缩小或关闭不全。C. 治疗: 瓣膜血栓形成一经确诊, 即开始静脉抗凝血治疗。成功率可达 70% 左右, 残废率 9%~10%。但是, 由于治疗出现栓子栓塞的并发症可高达 19%。因此, 除非患者手术死亡率很高或有手术禁忌证, 否则应积极动员患者手术治疗。②感染性心内膜炎, 人工心瓣膜置换术的心内膜炎发生率为 3%~6%。早期心内膜炎死亡率为 30%~80%; 后期死亡率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 图像资料卷/新疆天山天池
管理委员会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633-8289-7

I. 西… II. 新… III. 神话—人物形象—中国—图集
IV. B9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285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29 字数:120 千字 图片:362 幅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1 500 定价:18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远古人们结群而居，在集体劳动和共同生活中，创造了原始工具、记事符号、图画文字、原始音乐和舞蹈，同时也产生了原始神话。神话出现于原始氏族社会，并伴随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变化和发展。早在原始人群和血缘氏族时期，人们便已开始了早期文化的创造。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抗争自然的能力有所增强，活动范围也日渐扩大。考古发现一再证明，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中国西北高原、华北平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都有远古人类活动的遗迹。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则进入母系氏族社会高度发展的阶段，在中国黄河、长江流域，这种以母系血统维系的母系氏族更发展到全盛时期。中国古代神话中因而诞生了不少女性神话人物，如西王母、女娲、羲和等。母系氏族社会，妇女不仅在生产上起主要作用，而且还是原始聚落中胞族的轴心。她们常常被神化成人类及万物的创造者。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位神祇，其信仰至晚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汉代是西王母信仰的盛期，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较大范围内和较长时间里流行、具有民间宗教崇拜性质并具有常人形态的神，故又被海外学者称为“中国第一神”。而学术界认为西王母是中国西部距今三千多年前后，曾经广泛存在的母系氏族社会的代表性人物。

西王母：根据《山海经》记载，这位传说中的女神职司灾疫和刑罚，亦称为金母、瑶池金母、王母娘娘，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住在昆仑之丘的绝顶之上，昆仑之丘不仅是特指一个地

点，而应当是泛指相对中原而言的中国西部广大的区域。有叫做踞鸟（青鸟）的三足巨型猛禽，为其服役，又称三足乌。

三足乌：古代的太阳精灵，也被看作太阳运行的使者。中国古代传说太阳中居住着三足乌，人们敬仰太阳，三足乌也被作为祥瑞的象征来崇拜。1971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出土一幅彩绘帛画，右上方是一轮红色的太阳，太阳中间有一只三趾的神鸟。在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40年的《淮南子》中，就有“日中有踞鸟”的记载。据说由于三足乌一共有十只，不停地在天空中运转，导致地上遭受旱灾和灼热的煎熬。尧帝命令后羿将所有三足乌射杀，结果后羿射落九只留下一只，从此太阳只有一个并且在傍晚落下。而三足乌是服侍西王母的精灵，是专门为西王母觅寻食物的神鸟。

西王母与长生：传说西王母所在之处有“生命之树”，每三千年便长出代表长生不老的仙果。仙果在中国神话中的意义相当于西方的神奇苹果，是令众神得以长生的“神之食物”和“不死之神肴”（ambrosia），在波斯它被称为haoma，在埃及被称为sa；长生不老仙果中的蟠桃则演化成了西王母大宴众仙的专享圣果。它的本质是诸多文化传说中始祖女神创造万物的神圣之血——生命之源。西王母既掌握着死，又掌握着生。仅此两点，便可见西王母在上古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所以，有学者说：“在中国古神话中历来存在着一个辩证的观念：生神与死神，创造生命之神与刑杀生命之死神乃是同一位神。”

远古人们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神话故事，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精神艺术创作。神话并非现实生活的准确反映，而是由于远古时代自身能力低下，不能够科学地解释宇宙世界、自然现象和原始社会文化生活的起源和变化，仅以简单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借助想象把自然力和客观世界拟人化思考的结果。所以神话观念具有超越语言甚至文化的性质，上古中国的许多神话人物而今都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文化中的传说与宗教偶像。西王母崇拜就目前研究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也已不限于个别地域或个别民族，无疑已经具有跨地域跨族群的文化影响。首先，因为她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代表着繁殖与生长；其次，她还是西方仙境的领袖，是最大的神，她是中国

文化中佛教传入之前最重要的神与偶像，信众广布海内外；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道教形成后对西王母神话的流传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源于老庄哲学尊崇女性的思想引导，西王母由母系部族首领演变成仙，进而又成为道教最尊崇的众女仙之宗。西王母不仅能度人成仙得道，而且掌长生不死之药，握生杀长寿大权，所以，又产生了嫦娥偷长生不死之药成仙奔月的千古神话。西王母受到了渴望长生不死和成仙得道的汉代民间的狂热崇拜，她是护佑平民百姓的金母，又是汉武帝求仙不死的神灵。她是道教尊奉的元始天尊，成为汉画像石中有许多羽人侍者相伴的画像主题；也是称作扶桑大帝的东王公的对偶神，更是变成了玉皇大帝之后，慈善的王母娘娘，得到更加广泛的信奉。

新疆天山天池作为西王母神话传说中的夏宫和瑶池所在地，由古至今，以西王母文化为主体脉络生成、传承、发扬，形成了天山天池独特的道教文化。

汉代道教产生后，西王母文化与道教文化融合互生，在天山天池衍生了许多道教故事。历史典籍除《山海经》外，在《穆天子传》、《神异经》、《汉武帝内传》、《淮南子·览冥训》、《枕中书》、《西王母传》、《搜神记》等书中都有记载。而《穆天子传》是众多记载西王母文化的代表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穆王在与西王母惜别时的对歌中提出“和治诸夏”的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建设人类理想社会的思想精髓。

西王母瑶池会周穆王的故事，经后世的代代相传，特别是经天山天池周边地区本土文化的演绎，已形成内容十分丰富、人物形象十分鲜明、情节十分动人的系列故事，如《西王母瑶池盛宴周穆王》、《周穆王八骏赴瑶池》、《瑶池缘》、《玄女施法》、《西王母降妖》等，以及诸多民间世俗传说，如《王母私访》、《三度嫦娥》、《消灾门》、《夫妻树》、《醉仙林》、《蟠桃园》、《东方朔偷桃》等。

在道教多神论的影响下，本土居民还把天池的异石奇木都与西王母相联系，产生了大量的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故事和建筑。如说天池为西王母所造，既是她的沐浴处，又是她的梳妆镜；说天池北岸上的那棵老榆树，则是

她的头簪变成的一枚定海神针等。

唐代，天池道教文化有了新的发展，许多文人墨客受到西王母神话、传说等文化影响，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增加了天池西王母文化的文学底蕴。在这一文化流变中以唐代大诗人李白为最，在其《清平调》中写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诗中提到了西王母神话中的“群玉山”、“瑶台”。《天马歌》中更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再次提及西王母神话中的核心内容——“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穆天子传》）。李商隐的《瑶池》“瑶池阿母倚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的佳句，则广为流传，为西王母文化增添了千古帝王爱情故事的色彩。清代新疆成为清政府流放地，大批谪遣官员、文人来到这里，留下了丰富的诗歌、行旅笔记，使西王母文化呈现出多彩多姿的形态。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重视，经文化工作者搜集、挖掘，整理成《民间故事集成》、《瑶池与西王母的传说》、《天池传说与王母神话》（故事书籍）、《周穆王西游记》（连环画册）、《瑶池史画》（剧本）等。2007年2月，西王母文化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以西王母文化为主体的道教文化作为天山天池的主流文化，其文化发生的源头、文化绵延展扩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特质、文化对待人生的态度，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都有一定的分量。新疆天山天池作为中国社会各界公认的西王母仙居地之一，以弘扬西王母文化为己任，挖掘、整理、传承西王母文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也是做一大功德。

近年来，西王母文化受到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西王母神话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王母娘娘的记载有很多，反映的是中国前期的历史。时间跨度从远古直至两汉；地域覆盖从华夏故土放射到周边四夷、域外各国。两汉文化是佛教未全面影响中国以前的文化，是集中华固有文化之大成者，内容庞杂，记

录丰富，被视为一部形象的先秦文化和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作为对中华固有文化的寻根，西王母研究是一种直捷的方式和可靠的形式。正因为如此，西王母不仅吸引了文物考古界、艺术界，也吸引了包括历史、哲学、宗教、民俗、民族、天文、冶金、建筑、酿造、纺织等学科和专业的注意。今天的西王母研究实际上已朝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发展和朝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就西王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出现类似“敦煌学”的“西王母学”，本是情理中事。

2. 西王母在道教中地位极为特殊，全名为白玉龟台九灵太真金母元君、白玉龟台九凤太真西王母或太灵九光龟台金母元君，为女仙之宗，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得道登仙者，都隶属于西王母管辖。此外，西王母和东王公又是道气阴阳之父母，共理二气，育养天地，陶钧万物。

3. 西王母信仰在古代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研究也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如何开展西王母文化研究和弘扬的新局面，是今天西王母文化研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目前，国内已基本形成一支西王母文化研究队伍，不过人员庞杂，研究内容多停留在比附、揣测和为世俗利益服务的初步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规模和力度的加大，大量与西王母有关的出土文物不断涌现，新材料的出现不仅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也对研究的深度和范围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

国内外学术界以及社会其他相关领域对西王母的关注与研究虽说由来已久，但是对于相关传说的收集、整理，古代文献记载的梳理，考古资料的刊布与汇集整理，人文科学各个角度的深入研究可以说工作才刚刚起步，许多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新疆天池管委会深感有责任为西王母文化的研究与弘扬略尽绵薄之力。我们初步的考虑便是筹措出版《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大型系列丛书，以及进行与之相关的社会组织与文化弘扬工作。

丛书目的在于系统介绍国内外学术界和相关文学、艺术领域迄今所有关于西王母记述与研究成果，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且现今仍有重大社会、学术价值的重要资料与著作。我们将从基础资料与研究成果的汇集和刊布着手做起，逐步涉及并涵盖西王母文化的各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之中不到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会以续编或补遗

等形式加以完善，当然也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帮助，一同为研究和弘扬西王母文化尽力，以此为中华文化推陈出新和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迟文杰

2007年10月18日

序 言

—

神话传说和神话故事，作为世界各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对自然及社会现象的理解和想象的一种艺术表现，是古代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创造并逐步演化而成的，用以解释自然界、解释人类社会、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古代的神话，作为古代人们的信仰和思想意识的一种载体，反映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无知与无奈，表现了人与大自然的顽强搏斗，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世界的向往和追求。

大凡神话，其主体是“人”以及人的活动。于是，各种神话人物应运而生，西王母就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一位十分重要的神祇。西王母，又被称为“金母”、“瑶池金母”、“王母娘娘”等，有关的传说甚多，流传甚广，也最为人们所熟知。西王母作为神而见诸文献记载，最初见于《山海经》，说明至迟在战国时期关于西王母的信仰已经形成。传说中最初的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西次三经》），是一位执掌刑杀及灾病的凶神。但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万物尽有”，尤其是拥有长生不死之药，于是又同生联系在一起，成为长生不老的象征。于是，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成为人间向往的仙界，昆仑山主西王母也逐渐由怪身演变成一位血肉丰满的女神。到了汉代，西王母受到了渴望长生不死和得道成仙的人们的狂热崇拜，甚至出现了西王母给汉武帝送蟠桃的故事，西王母成了当时最受崇拜、最大的神，西王母信仰达到了

最盛时期，成为当时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东汉中叶以后，随着道教的逐渐形成，西王母被尊奉为道教的元始天尊，赋号“太真西王母”，成为众女仙之宗，并且与被称之为扶桑大帝的东王公一起，化育万物，缔造世界。

二

两汉至魏晋时期盛行的西王母信仰，不仅反映在古代文献记载的有关神话传说和神话故事之中，而且在考古发现的各种实物资料中也有直接而形象的展现，成为研究当时西王母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考古发现的有关西王母的实物资料，包括图像资料和铭刻资料两大类。其中，铭刻资料主要是画像石上的有关题榜和铜镜上的有关铭文，为数不多；而图像资料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多样，内涵丰富。这些图像资料见于画像石、画像砖、壁画、画像石棺、铜镜，以及铜棺饰、铜摇钱树和漆器等，其中最为多见和常见的是汉画像石和汉晋铜镜。

汉画像石，是西汉晚期至东汉末年用以建造和装饰墓葬的画像石刻，原来多施以彩绘。一般所说的画像石，实际上还包括地上石结构祠堂、石阙的画像石刻。汉画像石主要发现于山东、河南、苏北、皖北、鄂北、陕北、晋西北、四川等地。汉画像石的著录和研究，是伴随着金石学的兴起而开始的。南宋洪适的《隶释》和《隶续》中著录有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石刻画像和题榜文字以及其他的画像石，首开摹录汉画像石之先河。清代乾嘉以后，摹录之风更为盛行。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中外学者先后著录并刊布了山东、河南等地发现的汉画像石，并且河南南阳和山东曹县的汉画像石墓经过了调查和发掘。1950年代以后，汉画像石墓调查和发掘的数量迅速增加，发现地域迅速扩大，随之汉画像石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逐步展开，并且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其重要的内容之一是神话故事和仙人图像，如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四神和象征神仙世界的奇禽异兽等，而西王母就是其中最为常见的图像之一，并且有的在图像旁有“西王母”的题榜。正因为如此，不仅有关汉画像石的图录、考古报告和论著中对其多有论及，而且还有不少关于西王母图

像的专门研究及其成果。

汉晋铜镜，是西王母图像的另一种常见载体。在我国，铜镜的起源大致是在4000多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经过夏商至春秋时期的缓慢发展，战国时期趋于成熟，到汉代形成了第一个发展高峰。古代铜镜的著录和研究，同样始于金石学兴起的宋代，经过清代的发展，到20世纪初叶出现了专门著录铜镜的金石学著作，铜镜研究逐步成为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镜鉴学”。铜镜的纹饰种类繁多，因年代的不同而多有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铜镜纹饰中人物形象的出现是在战国晚期，而西王母形象的出现有可能上溯到新莽时期，但其流行开来是在东汉中期，并且往往与东王公并存，其代表性镜类是神兽镜和画像镜，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及其南方地区。目前所见有西王母形象的神兽镜中，其年代最早者是汉和帝元兴元年（105）纪年镜。画像镜的出现有可能上溯至东汉早期，但其盛行时期是东汉中期至汉末三国时期。其中的“神人车马画像镜”和“神人禽兽画像镜”，其主题纹饰是东王公、西王母，并且有的在神像旁还有“东王公”、“西王母”的题款。到了东汉晚期，有的铜镜上虽然没有西王母的形象，但镜铭中却有“西王母”，如河南南阳市博物馆藏的一枚“变形四叶兽首镜”的铭文是：“建宁元年（168）九月九日丙午，造作尚方明镜，幽涑三商，上有东王父、西王母，生如山石，长宜子孙。”¹需要指出的是，包含西王母图像的神兽镜和画像镜早在清代乾嘉年间就曾被著录，关于纹饰中的西王母形象在不少铜镜的研究论著中也有所讨论，但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

西王母的形象，还见于汉代壁画中，并且出现的年代较早。迄今所见之汉代壁画，几乎全部是墓室壁画。汉代壁画的发现，始于20世纪初日本学者在东北地区的辽阳、旅顺一带对汉魏壁画墓的发掘。新中国建立之后，汉代壁画墓的发现日渐增多，1950年代以来共发现70余座，分布于辽宁、内蒙古、河北、山东、江苏、河南、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地。在汉代，壁画墓出现于西汉晚期，流行于东汉时期。汉代墓室壁画中，也包含神话故事类的题材内容，如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一类仙人和表现天上世界的仙禽

1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77页。

神兽等。1957年发掘的洛阳烧沟附近发掘的一座西汉晚期壁画墓（烧沟61号墓），其墓顶的隔梁上部有用空心砖雕镂彩绘的西王母和各种仙禽神兽形象。¹这是汉代壁画中最初出现的西王母形象，也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西王母形象。关于汉代壁画中的西王母形象，虽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研究，但更多的是在有关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壁画题材内容的论著中加以论及。

画像砖，是一种建造和装饰墓葬的带有图像花纹的墓砖，其画像均系模印而成，当初也饰有彩绘。汉代画像砖出现并流行于东汉时期，其分布地域主要是在成都平原一带，河南等地也有所发现。早在清代末年，汉代画像砖就曾引起收藏家的注意并被收藏和著录。其题材内容，大多与汉画像石相近，同样包含各种神话故事，西王母也是其常见的图像之一。四川成都、新繁、新津、新都、彭山，²河南新郑、南阳³等地都曾出土有西王母图像的画像砖，相关分析和讨论散见于有关画像砖的图录以及西王母研究的论著之中。

西王母的形象，还见于画像石棺的石刻画像之中。所谓画像石棺，是指在棺身四周和棺盖雕刻有图像花纹的石棺，出现于东汉中期，流行于东汉晚期，有的年代可晚至三国时期。画像石棺主要分布于四川、重庆和云南的东北部一带，是在中原地区画像石的影响下并与当地的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产生的。因此，无论其雕刻及表现手法还是其题材内容，大都与汉画像石相似，而以西王母为中心的仙境图像，更是其主要的内容之一。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画像石棺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此后随着发现的逐渐增多，相关研究逐步展开。⁴

除上述各种实物资料之外，汉代的西王母图像还见于四川和重庆等地出土的铜摇钱树、长江三峡地区发现的鎏金铜棺饰，以及朝鲜平壤附近东汉王盱墓出土的永平十二年（69）漆盘等，因资料不多，不再一一叙述。

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2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31—136页；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图九六至九九。

3 薛文灿、刘松根：《河南新郑汉代画像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72页。

4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

上述实物资料中的西王母图像，尽管所表现的都是西王母及其所处的仙境，但往往因年代、地域、载体等不同而在表现形式、内容详略上多有差异。如西王母的形象，有的头戴方胜，有的则发绾三环高髻、肩生双翼；四川一带画像砖石上的西王母一般端坐在龙虎座上，而河南出土画像砖上的西王母则常常坐在山峦之上；简略者仅配一持杵捣药之玉兔，详尽者则在其周围描绘出三足乌、蟾蜍、持灵芝的玉兔、九尾狐、持荣戟而立的“大行伯”等祥瑞以及跪拜者，而铜镜纹饰中西王母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侍女或羽人。纵观西王母图像的载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丧葬活动有关的文化遗存，如画像砖石、墓葬壁画、画像石棺以及铜摇钱树、鎏金棺饰等；另一类是日常生活用品，主要是铜镜，另有少量的漆器等。前者属于阴间世界，主要表达了被葬者死后升天、得道成仙的心理诉求和精神追求。后者属于阳间世界，主要表达了人们希冀长生不老、子孙兴旺的企盼和愿望。

三

西王母信仰以及由此形成的西王母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文献记载和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相互参照、有机结合，方可不断前进。西王母信仰和西王母文化的研究同样如此。事实上，已有不少学者正在进行着这样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将散见于各种考古报告、图录及有关论著中汉晋时期包含西王母图像的画像石和铜镜资料加以收集和整理，将其中的368件系统地刊布，不仅为西王母文化的研究者提供极大的便利，而且其本身就是西王母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对于古代西王母信仰和西王母文化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本书对西王母图像资料的系统收集和整理，就考古学的发展和繁荣来说，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考古学是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考古发现的各种实物资料涉及古代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于是，考古学研究就出现了诸多专门的研究领域，形成了诸多的研究专题乃至分支学科，成为考古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考古学专题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而形成的，如石器研究、青铜器研究、铁器研究、画像石研究、壁画研究、铜镜研究、陶瓷器研究等；另一类是根据特定的研究内容而形成的，如农业考古、环境考古、宗教考古、美术考古等。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一方面是传统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是新兴专题研究的出现和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学专题研究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因此，既要重视新兴专题研究的开拓，又要重视传统专题研究的深化。针对某些轻视传统专题研究的倾向，2006年秋我在“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讲过，对于一些具有很长的研究历史的传统课题，“如果对其分别进行资料的系统梳理并采用新的方法、新的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有望取得新的重要进展”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对有关西王母图像的汉画像石和汉晋铜镜资料的系统收集和整理，不仅是西王母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是深化汉画像石和汉晋铜镜研究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考古发现的各种实物遗存，不仅是当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直接实物遗留，而且深深地被打上了精神生活的烙印。于是，根据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不仅可以研究古代社会的物质文化，而且同样可以研究古代社会的精神文化。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早就呼吁，考古工作者应当“多花些精力来研究考古学资料所包含的古代精神活动方面的问题”²。对于有文字记载之前的史前时代来说，史前考古学几乎承担了探求人类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构建整个史前社会历史的全部任务；而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来说，虽然有了大量的文献记载，但精神文化研究同样是历史考古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并且同样有着广阔的前景。近年来我多次强调，历史考古学的主要任务和研究的重点，是“物质文化的研究，精神文化的物化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实证化研究”³。就本书所收集的资料而言，画像石作为丧葬文化遗存，其图像是当时人们的丧葬观念、生死观念、宗教信仰等精神生活的直接记录和形象再现；而铜镜作为日常生活用品，其纹样和铭文同样是当时人们

1 《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2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42页。

3 《探古求原》，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36页。

的美学观念、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等精神生活的反映和折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对有关西王母图像的汉画像石和汉晋铜镜资料的系统收集和整理，也是根据实物资料研究精神生活，即“精神生活的物化研究”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我期待着各种形式的考古学专题研究成果的问世，期待着更多的关于古代人们的精神生活的物化研究的成果的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

2009年2月20日